论满族形成时期的文化结构

胡　凡

when Mans came into being, soical production, which was on behalf of its material and culture, shoned many aspects organizations; argriculture led central role, collecting and hunting were still very important, so did its social system and culture. In culture, it appered approuching and obeying the heaven and summing up the history experience the existance of all kinds of religious belief the abstraction of Hans' ethlic, the use of mangolia's character. This was a wery open of culture. It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rise ma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g Dynasty.

"文化"一词涵盖的面非常广，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文化所下的定义也各不相同。本文认为，文化是从古至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知识系统的总和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它的物化结果，它包括静态的积累和动态的创造两个方面。人类要进步、发展，就离不开知识的积累和传承，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形的物质产品都是这种知识体系的物化和结晶，它反映着人类在某一特定时期对知识的占有程度和对世界认识的深度、广度；世界各国各民族所采纳的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组织、法律制度等等不同，都是由于人类这一群体对社会知识的认识和把握不同，因而所采取的选择也不同；人类几千年来思想的演变，对自然掌握的程度，当今世界高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都是人类知识在累积基础上的创造。正因如此，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看，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都是人类知识的一种体现，其中凝聚着人对世界的看法，人对世界能动的反映和积极的适应。制度文化体现着人类对社会体系把握和控制的程度，反映着人类总体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维护社会健康发展、提高管理水平方面的进步。精神文化体现着人类理性思维、形象思维和艺术创造的发展历程，人类的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无不体现出这种知识积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正因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知识体系，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创造的程度和方式方法有别，所以各个时代的知识体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而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征。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形成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具体地说就是从 1583 年努尔哈赤起兵到 1635 年皇太极正式确定满族的名称，并于翌年建立清王朝为止。满族渊源于女真族，女真族在其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具备了形成民族共同体的各主要因素，因此才能在明末以建州女真为核心，迅速地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这里作为一定时代的知识体系而累积、传承并为人们进一步创造的文化，在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又影响并制约着它的社会发展。本文拟从个人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出发，对满族形成时期的文化结构作一分析，以求能比较地接近历史的原貌。不当之处还望方家学者教正。

一

人类的历史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由此而展开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构成一切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基本前提。人类在制造工具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器物，代表着一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代表着人对世界的认识程度、人们的生活状貌，因而构成文化史研究中物质文化的内容。据此，所谓物质文化，是和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由人类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各种知识及其主要成果累积起来形成的有形的社会物质力量。在满族形成时期，它的社会生产呈现出一种多层次的结构，是以农业为主、采集和狩猎仍占有重要地位的社会经济，这和满族历史发展的渊源有直接的关系。满族发祥的东北地区，有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历史上在这里活动的先民，其生产结构大多都是农业、狩猎、采集、畜牧并存。渤海国的农业已达到较高的发展阶段，辽、金时期的农业生产已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黑龙江考古发掘的金代铁器中，农业生产工具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辽代的女真人种植五谷，“以耕凿为业”①，完颜阿骨打起兵以后很注重农业生产，下令“摘取诸路猛安中万余家，屯田于泰州”②；在天辅七年（1123年）有诏书曰：“今农事将兴……无纵军士扰动人民，以废农业”③，可见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北宋许亢宗出使金国，路途所见“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始遍”④。迨至明初，女真三大部中，建州、海西女真的农业生产已相当发达。据朝鲜《李朝实录》载：努尔哈赤的祖先猛哥帖木儿时期，女真人就在所居地区从事农业生产，也兼打围放牧。正统时期，建州女真首领李满住居住的婆猪江（佟佳江）地区“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满于野”⑤。嘉靖年间，谪戍辽东的明监察御史卢琼记载说：“建州、毛怜、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庐”；建州女真“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海西女真“俗尚耕稼”⑥，哈达部“颇有室庐房屋、耕田之业，绝不与匈奴逐水草相类”⑦。三部中只有野人女真中的北山野人“不事耕稼，惟以捕猎为生”⑧。就连受辖于野人女真的脑温江地区的生女真，也“事耕种，言语居处与建州类”⑨。到明末，建州女真的粮食产量在肥沃的土地上“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⑩，瘠薄的土地能收一石，因此，在抚顺关的马市上，粮食成为建州女真出售的重要货物之一。证之域外史料，沙俄哥萨克波雅科夫在入侵黑龙江流域时，在结雅河两岸见到的是：在森林掩映的山岗中间，时有达斡尔人的乌卢斯——小保寨，隐约可见；在眼前展现的是黑油油的耕地，各种牲畜在草地上游荡，吃草。那里的达斡尔人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定居户，有房舍和耕地。……沿着阿穆尔河住着各种民族。他们的酋长隶属于一位有势力的满洲王公，而这位王公是听命于中国汗的⑪。这些事实说明，在满族形成前的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女真人的主要生产部门。

与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采集和狩猎在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这和东北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狩猎和采集经济往往发生在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中，东北地区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东南有巍巍耸立的长白山，绵亘千余里，林深树茂。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从这里发源，向北、东北、东南分注入海。滔滔不绝的黑龙江横贯北边，其间山脉纵横、江河交错，松辽平原、松嫩平原如一片片锦绣的地毯，铺设在这白山黑水之间，不仅景色十分壮丽，资源也十分丰富。这里盛产的人参、珍珠和各种皮毛，是女真人向明朝进贡、与汉族交易的主要货物。据《满文老档》和《满洲实录》所载，这里所产的有明珠、人参、三种貂皮、黑白赤三种狐皮、猞猁皮、豹皮、海獭皮、水獭皮、虎皮、青鼠、黄鼠等皮，

又有棉、丝棉、布、葛布、盐，还有金、银、铁等等⑫。这些丰富的物产，成为女真人生活的重要来源，也影响着他们的生产结构。明王朝凭借着对女真人的统属关系，让女真人按时、定量的朝贡，所贡物品有蜂蜜、人参、东珠、貂皮等等。因此，每年三月至五月、七月至十月的采集季节，女真人每十多人至三十人结伴入山，搭棚栖居，挖人参、采松籽、拣榛子、拾蘑菇，下河采珠，然后进贡给明廷；或者到马市和汉族、朝鲜进行贸易，换得耕牛、犁铧等生产工具和日用品，用来发展生产，补助生活。每到狩猎季节，女真人便有组织地进行打围。据《满洲实录》卷三载："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女真人的狩猎活动，一是按照族、寨集体进行，各个族寨的人数多寡不一，为便于管理，就出现了十人为一组的牛录组织。二是身为十人长的牛录额真，是临时推举的首领，负责指挥围猎。这种狩猎活动是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的。从民族学的资料来看，东北地区以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鄂温克人、鄂伦春人，每当集体围猎时，公社成员全都参加，他们把有野兽的大山林用木栅栏围起来，四周留下几个缺口，出口处挖好陷阱，拿弓箭的人等在陷阱旁，山上男女老幼齐声轰撵野兽。野兽从山林中跑出来，见到出口就往外窜，一下子掉进陷阱里，拿弓箭的人们就可以很有把握地射杀摔入陷阱中的野兽。或者是先把野兽赶到一个山头，山脚四周站好人，每人都点燃一堆火，边呼叫边摇动火把进行轰吓，逐渐缩小包围圈，野兽四面受敌，惊恐万状，来回奔跑，这时猎手用弓箭伺机射杀之⑬。这里的弓箭既是女真人的生产工具，又是其战斗用的武器，由此而形成女真人骑射的传统，虽"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⑭。这种狩猎方法是集体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围猎，从《满文老档》、《满洲实录》的记载及入关后清廷所保持的狩猎爱好来看，女真人的狩猎方式当以后一种为主，而《啸亭杂录》卷七所载之"木兰行围制度"，则已是从这种狩猎方式演变而成的清帝操练部队、巡狩游乐的一种制度了。和这三重生产结构相适应，女真族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发展起来。建州女真的手工业是"银铁革木，皆有其工，而惟铁匠极巧"⑮，这和打造军器有直接关系。努尔哈赤所住的都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铁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⑯，足见分工的规模。商业则主要是以狩猎、采集所得的人参、貂皮、东珠以及马匹等物，通过入京"朝贡"和开原、抚顺等关的马市贸易，交换日用品和生产工具。这些交易所得一方面自己消费，另一方面则转相与东海野人女真贸易。至于畜牧业，在当时也占着重要地位。申忠一《建州纪程书启》称"六畜惟马最盛，将胡之家，千百为群，卒胡之家亦不下数十匹"，所以，马匹一直是女真人与汉族交易的主要货物。并且，马匹的畜养，对女真人的狩猎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弱都发生巨大的影响。

二

人类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以群体的方式进行生产、生存与发展。为了管理社会群体的各项事务，为了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人类通过对各种社会知识的总结，创造了相应的制度，它也是人类知识系统化的结果，无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法律制度、教育制度，无不如此。这就构成文化史研究中的制度文化。据此，所谓制度文化，即是某些民族或社会集团在彼时彼地所特具的一套社会组织纪律，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等抽象体系。任

何社会制度都针对一种根本的需要，都须建筑在一套物质的基础上。其中家庭、住户、村落社区、政治、经济组织以及职业行会等大概要算最普遍、最主要的制度了。农业、狩猎、采集并存的生产结构，决定着满族形成时期制度文化的多重结构。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之与辽东、朝鲜的频繁接触，大量汉族人民因明廷的残酷剥削而逃入女真地区，使女真人对封建制度并不陌生。首先，定居的村落城堡中，已经建立了户籍制。努尔哈赤兴起以后，攻灭哈达，降民编入户籍；攻灭乌拉，编成万户；攻取东海女真诸部，也都进行了编户。这种户籍制度可能有三个渊源：一是金代以来女真族固有的；二是从与朝鲜及汉族的交往中学来的，特别是辽东地区的户籍制对女真人的影响更大；三是与八旗制度相表里，但又不完全相同，户籍制度的实行当更广泛。如东海野人女真未加入满族的部分，皇太极及其后继者将他们按姓氏（喀喇）和村屯（噶珊）为单位，编入户籍，“各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⑰。户籍制度使女真人在其形成民族的剧烈变动时期，不致发生混乱，能够有条不紊地把分散的女真人组织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同时也构成满族封建社会的根基。

第二，政权模式集权化与贵族议政的二重结构。努尔哈赤兴起以后，1587 年（万历十五年）在费阿拉建城称王，“筑城三层，启建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⑱，这是满族国家政权的雏形。1616 年（万历四十三年，天命元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又设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扎尔固齐十人管理国政，“凡事扎尔固齐先审理，次达五大臣，五大臣鞫问，再达诸王”⑲，后金政权初具规模。此时其政权的模式属于集权形式，努尔哈赤居于权力的顶端，这个位置是他以一生卓著的战绩而确立的。到他晚年，为解决立储的难题，保持后金政权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实行了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体制。新汗要由八大贝勒共同推举，凡军国大政，都由八大贝勒共同商议，乃至于更换新汗；并“设立诸申大臣八人、尼堪大臣八人、蒙古大臣八人”⑳。这是一种贵族政治，即八家贵族联合掌权。及至皇太极即位，努力提高皇权，缩小旗主权力，上台伊始，每旗置总管旗务大臣一人，佐管旗务大臣二人“总管一切事务，与诸贝勒偕坐共议”㉑，同时又不断添设新机构，另立三院八衙门，重用汉族地主阶级，从旗主手中攫取行政权力，天聪五年（1631 年），皇太极“南面独坐”㉒，废除了贵族议政，重建君主集权的政权模式。满族形成时期政权模式的这种变化，是与其生产结构、历史传统有着直接关系。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农业社会比较容易产生等级制和权力集中化，而狩猎和采集的社会是颇有代表性的平等社会。满族在其形成时期，农业生产已相当发达，又受汉族、朝鲜、蒙古的封建文化影响，产生集权政体是很自然的。但满族又有长期的狩猎传统，在狩猎过程中，人们的关系是互相配合的平等关系，八大贝勒共议国政，实际就是狩猎经济在政治上的一个投影。

第三，八旗制度成为满族的社会组织、军事组织、生产组织。牛录，最初是女真人狩猎时的一种临时性组织。努尔哈赤兴起之后不久，牛录逐渐变成了军事组织，在史籍中也见到以牛录额真为官名的记载。1584 年（万历十二年）努尔哈赤攻克翁鄂洛城，对曾射伤过他的两个人鄂尔果尼和洛科采取了宽大的政策，“赐以牛录之爵（属三百人），厚养之”㉓，可见这时已出现了三百人一牛录的军事组织。1601 年（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对军事制度进行了一次整编，“上以诸国徕服人众，复编三百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至是，遂以名官”㉔。这里说的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足见是一次正规的整顿。此时努尔哈赤的军队已有了旗的建制，朝鲜申忠一在万历二十四年到建州，见努尔哈赤的军队“旗用青、黄、赤、白、黑，各付二幅，长可二尺许”㉕，这些为以后八旗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615 年（万历四

十三年），努尔哈赤正式创建了八旗制度。据《满文老档》载："英明汗从过去就梦寐以求，整顿围猎、用兵规则，制定法令，无所不言。"于是"淑勒昆都仑汗把聚集的众多国人，都平均划一，三百男丁编成一牛录，一牛录设额真一人，牛录额真以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和村领催四人。四名章京分领三百男丁编成达旦，无论做什么事情，去什么地方，都规定达旦的人同行"㉖。《满洲实录》载："太祖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五牛录立一甲喇额真，五甲喇立一固山额真，固山额真左右立梅勒额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㉗。固山为满语，汉译为旗，每旗有一特定颜色的旗帜，合成八旗。

从八旗制度的形成，可以看出它是渊源于女真族原有的狩猎组织，由临时性的自由组合逐步演变、扩大、改组，最终成为一种正规的、永久的制度。八旗制度具有多种功能。首先是它的军事功能。八旗军队分为长甲军、短甲军和巴牙喇，后来演变为前锋、骁骑、护军。作战时，"披重铠、执利刃者为前锋，披短甲（即两截甲也）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于别地相机，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出处同前）。努尔哈赤军纪森严，"只以敢进者为功，退缩皆为罪，……是以临阵有进无退"㉘，这就使得八旗军战必胜、攻必克，所向无敌。同时，这种英勇善战的作风，也和女真人长期的狩猎传统有深刻的关系。女真人围猎之时，无不是跃马拧枪，弯弓射箭，各以多得猎物为愿。这种生产方式在满族形成时期，从生产领域转向军事领域，也就造就了八旗军队的勇猛顽强，所以清廷入关之后，还念念不忘地要保持国语骑射了。其次是它的组织功能。八旗制度又是一种民政组织，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统治本旗之人，其基层领导就是牛录额真。牛录额真和其属下的村领催等官员，掌管本牛录、本村屯的民政事务。整个八旗制度由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构成了一套系统的行政组织，把分散的女真人组织起来，由此而促进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三是它的生产功能。八旗兵"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㉙，牛录又成为生产的基层组织，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谈到。总之，八旗制度的特点诚如萧一山先生所言："其以兵为政之制，与欧洲日耳曼族迁徙时之情状正同。盖以战争而得国，则所赖者惟将领；文武不分，军政合制，国家初建之时，往往然也"㉚。

第四，经济制度的状况。经济制度即一定社会中管理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制度，它亦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的分配、劳动群体的组织构成和进行生产以及社会劳动的分工是其主要内容。由于满族在其形成时期已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故土地制度成为其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其土地的分配是以牛录为基本单位，计丁分配，亦即"计丁授田制"。在努尔哈赤初起之时，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是屯田。据申忠一《建州纪程书启》载：当时建州女真"粮饷于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酋长掌治耕获，因置其处而临时取用，不于城中积置"。这种屯田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但据后来的记载看，屯田的土地主要是按丁分配。《满文老档》载1615年的屯田情况是"一牛录出男丁十人，牛四头，耕种荒地，收获许多粮谷，充实了仓库。为记录仓库粮谷的出入分配，任命了十六名大人，和八个巴克什"㉛。从这两段记载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牛录是农业生产的基层组织，一牛录出男丁十人、牛四头耕种土地；同时，已经有了粮食的贮藏管理制度，任命了掌管仓库的官员，这比过去"秋收后不即输入，埋置于田头，至冰冻后输入"㉜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这也是适应战争的需要而必然要发展、完善起来的。到1621年（天命六年），这种计丁授田的制度进一步清楚、完善，史载当时"收取海州地方十万日，辽东地方二十万日，总共收取田三十万日，给在这里居住的

我们的兵的人马。……我今计田，一男种粮的田五垧，种棉的田一垧，公平地分给。……每三男种一垧贡赋的田，二十男中一人当兵，同时二十男中一人应公差”㉝。这里，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的轮廓都显现了出来。应该说明的是，整个天命年间，女真人的土地制度基本都是这种计丁授田制下的牛录屯田，牛录是最基层的生产组织。其生产情况是“各牛录住在辽东的男丁合并计算，其中三分之一驻防，三分之二的男丁在辽东耕田。好兵驻防，孤身的好男丁不差遣要留住。牛录的人代耕那田”㉞。相应的赋役制度，用的都是女真人原来的制度，“贫富都公平地以男丁数目计算。男丁二十人征兵一人，如果遇有急事，每十人出一人应差。如果没有急事，百人中出一人应差。根据需要，从百人以下、十人以上派差”㉟。计丁授田制及其赋役制度的封建性质是勿庸置疑的，它一方面是针对明朝那种“不以男丁数目计算，而按门户数目负担”㊱的弊端，防止隐匿男丁而造成贫富负担不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女真人原来的制度，当是一直沿用着“以男丁数目计算”的办法。这种以男丁计算的办法，又和女真人狩猎生产中传统的平均分配方式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计丁授田”的土地制度，渗透着女真人生产结构的各种特点，它既和明代辽东地区的军屯及女真人几百年来的农业生产方式有着渊源关系，又反映出狩猎生产在农业生产中的影响。至于天命十年的“编丁立庄”，它主要是针对辽东汉人的反抗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即把甄别出来的汉人纳入农庄体系中，便于管辖、统治，防止汉族人因民族矛盾而反抗后金政权。它的参照系是女真人早已存在的“拖克索”（农庄、农幕），是一种贵族土地所有制。及至皇太极即位后，又对汉人实行“分屯别居，编户为民”的政策，这更是一种封建政策的实施，它使大量汉族人成为独立的个体农民，进一步标志着满族封建经济的深化。

三

人是有灵性的高级动物，这种灵性就在于他有思维，有意识。他除了有广泛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之外，还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他有信仰、有思辩、有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有对生活的体会和艺术的创造，形成人类充满神奇魅力的精神世界，这精神世界通过语言和文字的外化，形成各种知识，为历代人们所传承，因而形成了文化史研究中的精神文化。据此，所谓精神文化包括一定时代的世界观——哲学思想、道德、教育、科学、艺术、以及社会的风俗习惯等等。满族的形成是和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的活动分不开的，他们父子作为建州女真的最高首领，其思想信仰、道德观念对满族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首先表现为对天命观的提倡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在女真人的多种经济结构中，虽然农业经济已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其狩猎和采集经济的悠久传统，等级观念比较淡薄，因而才出现“争夺无已时”的局面。努尔哈赤以建州左卫一个小小的部落首领而起兵，为了给自己的军事征服套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大力提倡天命观。他每每对部下、对其他女真各部宣称自己是得天之命，蒙天眷佑。这种对天的尊崇，既渊源于女真人原有的天神崇拜，又受到汉族封建文化的深刻影响。如1593年叶赫等九部联军进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先是宣称“我承天命，各守国土，彼不乐我安分，反无故纠合九部之兵，欺害无辜之人，天岂佑之”㊲，以安众心；开战之前又率众谒庙，求天佑助。1616年努尔哈赤建元称汗，年号即为“天命”。努尔哈赤兴兵攻明，还要“告天兴师”，宣布七大恨。皇太极即位后，对天命更是大力提倡，甚至造出红衣大炮都要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把沈阳称为“天眷盛京”，赫图阿拉称为“天眷兴京”㊳。

其他宣扬天命的言论更是史不绝书，勿庸详述。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上，满族统治者非常重视对政治法度的建设，这和他们的天命观是一脉相承的。如努尔哈赤认为："政法清明，蒙天眷佑。凡人君之祸，不自外来，皆由自出。昔桀帝、纣王、秦二世、隋炀帝、金帝完颜亮，皆嗜酒贪财好色，不为国劳，不修国政，故所创基业因其无道而败也！尔明帝政法不明，纵容太监敛取民财，众官亦效法其帝，皆搜刮民财。奸诈之富人行贿可以豁免，正直之贫民因无财而陷于苦难。……天遂谴之，以明帝河东之地畀我。明帝所忧者，乃此也。天既眷我，授以土地，倘我不以天意治理之，恐受天责。所谓治者，乃此也。"㊴这里既有对天命的宣传，又有对历史经验的概括，更有对明朝现实弊病的针砭。皇太极进一步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加以阐述，他认为："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有未成而中废者，有既成而复败者，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者哉。独不观辽金元亦曾君临天下，反复转而属之明。可见皇天无亲，善则培之，否则倾之，乃不易之理也。"㊵这是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来论述明清兴亡的根源，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其次，在宗教信仰上，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既保留了女真人原有的信仰习俗，又接受了汉族、蒙族、藏族的宗教信仰并加以提倡和尊崇。明代以来，"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已很明显，努尔哈赤兴起以后，1615 年（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4 月在其"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大庙，三年乃成"㊶。这七大庙包括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痘神邓佐将军、玉皇大帝、马神、貂神。其中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是汉地佛教信仰的主要人物，玉皇大帝则是道教中的天神，关圣帝君是崇奉关羽的，马神是由于明代马政而在北方普遍信仰的民间动物神，只有邓佐将军和貂神是女真人所信仰的神灵。邓佐将军事孟森先生在其《清代堂子所祀邓将军考》（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原本也是汉族人物，貂神则完全是女真人独擅"参貂之利"的产物了。从七大庙的建立可以看出满族形成时期的宗教信仰也体现着这种"三教合一"的特点，而且多数是从汉地移植过来的。后来努尔哈赤迁都辽阳，亦建玉皇庙于城南教场，香火不绝，"后为贝勒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属下庄屯人拆毁，造棺彗市卖"，皇太极对此大怒，"追讯毁者，偿值重建"，还给办香火牲祭银百两㊷。随着满族的逐渐形成，为了吸收更多的人民，满族统治者对于流行于蒙藏地区的喇嘛教也采取了吸收、尊崇的态度。在天命六年，蒙古科尔沁老人囊苏喇嘛就到了后金。皇太极即位后，对喇嘛教更采取了尊崇的政策。在他打败察哈尔部林丹汗后，"有墨尔根喇嘛载古帕斯八喇嘛所供嘛哈葛喇佛至，上命于盛京城西三里外建寺供之，至是告成，赐名实胜寺"，该寺建得"殿宇弘丽，塑像巍峨"㊸，皇太极亲率内外诸王、贝勒、贝子、文武众官出怀远门，幸实胜寺，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可见推崇之至意。后又于崇德四年（1639 年）派特使到西藏"延至高僧，宣扬佛教，利益众生"㊹，到崇德七年（1642 年），"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上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还至马馆前，上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㊺。通过对喇嘛教的提倡和尊崇，使蒙古和西藏从心理上贴近了满族，为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女真人原来的宗教信仰如祭堂子、萨满教等，仍然在女真人中继续流行，不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每当出征之前或是战胜归来之后，都要祭堂子拜天，这种信仰和满族民间的跳神、祭杆子等习俗一直保存于整个清代。

第三，在伦理道德方面，更多地表现为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和推行，其中主要是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提倡。如努尔哈赤在建立政权之后，一再对臣下宣讲忠君事上的道理，用儒家的君

臣、父子、仁爱等观念作为其道德准则。他说："天子为汗，汗子为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即为民，主之子即为奴。汗以天为父，敬念不忘，明修天赐基业，则汗所承基业，何以废也。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敬念不忘，勿怀贪黩之心，勿为盗贼奸宄强暴之事，以公忠自效之，则诸贝勒大臣之道，何以败也。民以诸贝勒大臣为父，敬念不忘，不起盗贼奸宄强暴之事，不违法度，竭尽其力，则祸患何以及身。奴以主为父，敬念不忘，不生盗贼奸宄强暴之事，谨守奴仆之分，尽心效力，则刑戮何以随身也。汗受天之恩，而不顺天意，乃以自恃其才力而为之，不勤修政道，逆理而行，天若谴之，欲废其汗，汗能自守其位乎？……尝闻古籍有云：'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故自上而下，凡秉忠善之心而行者，福必积矣。福积岂有不致善之理乎？凡怀邪恶之念而为者，罪必集也。罪大岂有不遭殃之理乎？"㊻从这段典型论述中，可以看出其明显的敬天命、忠君事上等伦理观念以及日臻完善的等级阶梯。他还特别强调德政，天命五年正月（1620年）"上谕贝勒诸臣曰：国家建立制度，经理得宜，则民皆效顺，竟趣于善行而莫之御。抚有大国者，苟能覃敷德政，广谕善言，远邦之人，自逖听风声，争先归附矣。人君既以治国之务委任贝勒，贝勒亦当宣布德意，助兴教化，以仰副君上之信任也。"㊼这种德政，实际是对明末腐败黑暗政治的一种批判性的总结。皇太极亦深明儒家仁政礼治的作用，每对臣下说："盖闻古来用兵征伐，有道者昌，无道者废。上天感应之理，昭然不爽。故自恃其力而恣行杀夺，未有不败者也。克尽其道，而力行仁义，未有不兴者也。……朕惟欲体仁行义，制敌养民而已"㊽。对于儒家的修、齐、治、平之说，皇太极已是心领神会，每在议论国政之时教育其臣下要明善恶，当以生民休戚为念，"圣经有曰：欲齐其家，先修其身，身修家齐而后国治。尔等若谨好恶之施，审接物之道，御下以义，交友以信，如此则身修矣。孝其亲，悌其长，教训及其子孙亲戚，如此则家齐矣。身修家齐而国不治者，有是理乎？尔等当存忠直之心以为国，慎毋怠忽，有负朝廷。"㊾从这里可以看出，满族形成时期，在伦理道德领域已是全盘接受了汉族文化，而且当做治国之根本大计来推行了。

第四，在语言文字与教育方面，注重吸收、融汇与改造。满族文字是以蒙古文字为基础而制作，历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而完成。《满洲实录》卷三载：己亥年（1599）"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噶盖、额尔德尼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阿玛，父也）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额默，母也）吾意决矣，汝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这是老满文。到太宗天聪六年，又对老满文加以改造。《清史列传·达海传》称："初，太祖指授文臣额尔德尼及噶盖创立国书，形声规模本体略具；达海继之，增为十二字头。至是，上谕达海曰：'国书十二字头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犹易通晓；若人名、地名，必至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达海遵旨寻绎，酌加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协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由是国书之用益备。"这是新满文的创制。从上两段史料可以看出，满文的创制，既表现了满族形成时期

统治者的聪明才智，又反映出满族对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吸收、融合与改造。

满文创制以后，额尔德尼和达海相继翻译汉文经典，"其平日所译汉书，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俱成帙。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及《大乘经》"㊿。满族形成与建立政权时期，军务倥偬，尚能注意用满文翻译汉文典籍，用以指导其军政建设，足以说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远见卓识，其所收到的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史称"达海始用满文，译历代史书，颁行国中，人尽通晓"51。随着满族文字的形成，教育也显得日渐重要。皇太极深感使统治阶级的成员"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因而下令让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天聪五年宣布"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如有不愿教子弟读书者，自行启奏"52。这道谕旨可以看作是满族教育的发端，它突出说明了皇太极对读书明理的重视，它和后来对国语骑射的提倡一同构成了满族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满族文化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通过以上对满族形成时期文化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主要特点是多种成分并存，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兼容并包的态势，这对满族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满族能够迅速崛起于东北并进一步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深刻动因。物质文化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农业，它构成满族社会封建性质的根基，我们大可不必一见"为奴使唤"的字样就非要认定它是奴隶社会，它是满族制度文化中集权化趋势日趋发展的主要内因。狩猎经济及其相应的八旗制度，把分散的女真人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使满族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力，并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概，在明末中国政治真空的一瞬间，攫取了农民革命胜利的果实。精神文化更是适应了唐宋以来"三教合一"的历史趋势，对儒、释、道三教兼收并崇。对儒教的推崇促使满族迅速地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并造就以后几代帝王学习儒家文化的热情；对佛教特别是喇嘛教的推崇使满族找到了一件拢络其他民族、主要是蒙古族的法宝，加上盟旗制、联姻等种种政治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北方长期延续的民族矛盾，所以康熙才敢说"朕以蒙古为长城"，表现了超越前古的气魄。总之，正是满族形成时期文化结构这种开放的品格，使得满族迅速地发展起来，最终建立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强大王朝，给中国历史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

①《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神麓记》。

②《金史·婆卢火传》。

③《金史·太祖本纪》。

④《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⑤（朝鲜）《世宗实录》卷七七。

⑥《东戍见闻录》，载毕恭《辽东志》卷七。

⑦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王台列传》。

⑧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二。

⑨毕恭《辽东志》卷九。

⑩㉕㉜申忠一《建州纪程书启》。

⑪参见俄E·B·冈索维奇著《阿穆尔边区史》。

⑫参见《满文老档·太祖》卷十五；《满洲实录》卷二。

⑬参见吕光天《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⑭⑮㉘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⑯程令名《筹辽硕画》卷首。
⑰《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七一。
⑱㉓㊲《满洲实录》卷二。
⑲㉗《满洲实录》卷四。
⑳《满文老档·太祖》卷三十八。
㉑《东华录》卷一。
㉒《清太宗实录》卷十一。
㉔《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三。
㉖㉛《满文老档·太祖》卷四。
㉙《清太宗实录》卷七。
㉚《清代通史》卷七。
㉝《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四。
㉞《满文老档·太祖》卷三十五。
㉟㊱《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八。
㊳蒋氏《东华录》卷二。
㊴《满文老档》第二十八册，天命六年十一月，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㊵《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七。
㊶《满洲实录》卷四；《满文老档·太祖》第四册。
㊷《清太宗实录》卷八。
㊸《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三。
㊹《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九。
㊺《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三。
㊻《满文老档》第四十四册，天命八年正月至二月。
㊼《清太祖实录》卷七。
㊽《清太宗实录》卷九。
㊾《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四。
㊿51《清太宗实录》卷十二。
52《清太宗实录》卷十。